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王晓 高薇茗 魏乐平◎著



开野东南的民族丛书

何国强 主编

滇藏澜沧江谷地的教派冲突

中山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王晓 高薇茗 魏乐平◎著

滇藏澜沧江谷地的教派冲突

荒野东南的民族丛书

何国强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滇藏澜沧江谷地的教派冲突/王晓, 高薇茗, 魏乐平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3. 12

(芄野东南的民族丛书/何国强主编)

ISBN 978 - 7 - 306 - 04695 - 6

I. ①滇… II. ①王… ②高… ③魏… III. ①教派—冲突—研究—西南地区 IV. ①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6479 号



出版人: 徐 勤

策划编辑: 嵇春霞 徐诗荣

责任编辑: 徐诗荣

封面设计: 林绵华 曹巩华

责任校对: 廖丽玲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中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14 印张 271 千字

版次印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总 序

黄淑娉

青藏高原古称“羌野”^①，“喜马拉雅”与“横断”两条山脉在东南交汇，形成北半球地表褶皱最明显而紧密的区域——纵横千里，层峦叠嶂，忽而峡谷幽深、激流汹涌，忽而悬崖突兀、雪峰傲立。雄奇的景观掩饰着严酷的自然。适宜耕种的土地集中在河谷，陡峭的高坡土层稀疏、岩石裸露、杂草丛生，经常发生泥石流。山川、植被、动物、村庄依季节交替呈现出各种姿态：旱季，尘土飞扬、风霜严寒、万物萧条；雨季，四野青翠、鸟语花香、人畜徜徉于云端。

羌野东南素有“民族摇篮”之称。在北纬 $25^{\circ}\sim 38^{\circ}$ 、东经 $90^{\circ}\sim 104^{\circ}$ 的广袤区域，由东至西，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独龙江和雅鲁藏布江，史前时代的汉羌之争，造成部分羌人融为汉族，部分羌人西迁。^②西迁的羌人一部分沿着江河古道北上甘青，另一部分南下川滇，到达今川、滇、藏交界区，更有一些部落进入了东南亚。他们南北行走的整套路线分布的区域到公元前4世纪业已形成民族走廊。《史记》记载了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见到四川特产的见闻^③，那是公元前2世纪发生的事情。又过了两个世纪，最后一批迁徙者

① 《诗经·小雅·小明》曰：“明明上天，照临下土。我征徂西，至于羌野。二月初吉，载离寒暑。心之忧矣，其毒大苦！……”大意为周天子令诸侯征伐氐羌系部落，西行到青藏高原，将士思乡，无心恋战，企图班师回朝的情景。《说文解字》解“羌”，一为“远荒”；一为草本植物，如“秦羌”——兰花形，生长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接壤地带、海拔3000米的荒野，愈往西愈密。故“羌野”指今青藏高原东部，即今川、青、滇、藏四个省（自治区）相交界的区域。

② 如（南北朝）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52～253册）有“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獯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的记载，说战国初期（公元前475年）以“昂”为首的一支羌人迫于族群竞争的压力，由今陕地区向西南徙迁至玉树地区。

③ 汉朝的四川特产远播大夏绝不可能走西域丝绸之路，那样将徒增路程，最有可能的是走西南丝绸之路，起点为成都，终点为印度甚至波斯（今伊朗），中间点为夜郎（今贵州）、滇（今昆明）、南诏（今大理）、缅甸。这说明中西交通很早就贯通了。

沿着民族走廊进入东南亚。东晋、十六国时期(317—420年),鲜卑族从大兴安岭西迁,抵达青海湖与当地羌人杂处,出现西羌、吐谷浑、白兰、党项、附国、吐蕃、姜人等古代部族,也有南迁的情况出现。各氏族部落在南迁路中定居、联姻、繁衍,发生贸易、战争和宗教行为,经过千百年的基因采借与文化交流,演变出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景颇(克钦)族、克伦族、骠族、缅族、掸族等境内外民族。^①元明以降,封建国家的势力先后侵及这片土地。目前,一块归中国,一块归印度,一块归缅甸。《艮野东南的民族丛书》就揭示了中国西南川、滇、藏和川、青、藏接壤地带极具内涵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是藏族、纳西族、怒族、独龙族和傈僳族。这些民族人们的体质特征与三支种群有关:①蒙古北亚人,特征是高身材、中头型、高鼻型、前额平坦、黑眼珠,男人高大英俊,女人身材颇长;②蒙古南亚人,特征是身材略矮、低头型、前额微窄、褐色眼珠、低鼻型;③“藏彝走廊”型,介于前两者之间,又自成一类,其特征是中身材、中头型、中鼻型,孩子的眼珠较黑,成人的眼珠泛褐。具体来说,怒族和独龙族入带有蒙古南亚人的体质特征,藏族、纳西族和傈僳族人带有“藏彝走廊”型的体质特征。由于藏族人的来源复杂,内部族群众多,有的体质特征偏向蒙古北亚人。例如,三岩藏族人的体质特征与塔吉克族、维吾尔族、锡伯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北方民族关系密切些,跟藏彝类型的藏族关系疏远些。^②无论体质特征如何,这5个民族的人民都有率真淳厚、健谈好客、谦让刚毅、吃苦耐劳的一面。人们因地制宜谋取生活资料,建造房屋,修建梯田,引水渡槽,高山放牧;人们也抽烟喝酒、唱歌跳舞,知足常乐。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组织集中进行民族识别(1953—1956年)和少数民族语言与社会历史调查(1956—1958年)。根据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描述,当时藏族、纳西族、怒族、独龙族和傈僳族等民族已出现社会分化:有的社会结构呈尖锥形,如藏族的农奴制、纳西族的土司制;有的社会结构呈钝锥形,如保留着原始公社残余的怒族和独龙族。民族文化的保持与传承是通过社会结构来实现的。独龙江两岸的村落出现了头人、大小巫师(南木萨、龙萨)、工匠、平民、家奴。前三种人基本上是富裕的族人,他们拥有土地,蓄养奴隶,并未完全脱离劳动。奴隶来自债务和买卖,成为家庭的一员,由主人安排婚姻,给予经济开支。奴隶在公共场合(如祭礼、

① 参见(五代)刘昫《旧唐书》卷197列传第14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68~27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和(宋)欧阳修《新唐书》卷222上列传第147上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72~27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关于南蛮、西南蛮和骠国的描述。

② 参见何国强、杨晓芹、王天玉等《三岩藏族的体质特征研究》,载《人类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408~417页。

公议、公断等)与平民有身份界限。劳动过程中主仆地位不同,主人为奴隶提供生产资料(如土地、牲畜、农具、种子),并占有全部收获物。人们在社会结构中各居其位,各层次的差别不大,在血缘、地缘基础上发生的共济、共庆、换工等集体行为维持着内部平等,原始宗教和基督教起到恐吓叛逆者、安抚民众、制止反抗的作用。旧的社会结构被打碎以后,新的社会结构逐步建立,其所传承的文化与过去有着质的不同。

17世纪,西方人陆续进入喜马拉雅东部山区与横断山脉南部的多条河谷。早期的传教士、探险家带着猎奇的眼光看待这里的风土人情。19世纪伊始,民族学家、地理学家、行政人员、桥梁工程师开始进入这片地域上无人知晓、地图上一片空白的沃野。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150年间,他们记录了大量宝贵的材料。英国、美国、印度三国学者的成绩尤为突出,如果只见他们为殖民政府服务的一面而不见其科学记述的一面是不公平的。在此,我愿意借鉴沙钦·罗伊的书单^①,肯定J. 马肯齐、J. 布特勒、G. W. 贝雷斯福德、A. F. 查特尔、P. C. 巴利、B. C. 戈海尔、M. D. 普格^②等人的工作;我还要提到F. M. 贝利、F. K. 沃德、维雷尔·埃尔温、P. N. S. 古塔、马骏达、N. 罗伊、B. C. 古哈和S. 罗伊等人的努力,特别是约瑟夫·洛克、克里斯托夫·冯·菲尤勒-海门道夫和埃得蒙·利奇的奉献。

洛克于1922年到达中国西南边陲,在川、青、甘、滇接壤地带考察,为美国农业部、国家地理协会和哈佛大学收集植物和飞禽标本,在丽江度过了27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洛克的研究兴趣转移到纳西族的文化上。他的《纳西英语百科词典》收入了东巴教及濒于消亡的古纳西语,他撰写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叙述了当时甘青交界处、滇西北、川西南和西藏纳西族居住区域的地理、历史、物产和文化。1992年,迈克尔·阿里斯在纽约出版了《喇嘛、土司和强盗》,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回顾了洛克在川、滇、藏的田野研究经历。^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利奇在克钦山区打游击。那个地区为中国的滇、藏和印度的阿萨姆邦三面环绕,有号称“野人山”的莽莽丛林。利奇广泛地接

^① 参见(印)沙钦·罗伊《路巴族阿迪人的文化》,李坚尚、丛晓明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302页。

^② 他们的代表作分别为《孟加拉东北极边地区山区部落记事》(1836年版)、《阿萨姆山区部落概述》(1847年伦敦版)、《阿萨姆东北边境记》(1881年西隆版、1906年重印)、《阿波尔的吊桥》(载《皇家工程师》1912年第16卷)、《阿萨姆山区部落的头饰》(载《皇家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1929年总字第25卷)、《阿波尔人的农业组织》(载《人类学系调查报告》1954年第3卷第2册)、《东北边境特区的娱乐活动》(1958年版)等,这里仅仅提到很少的一部分。

^③ 参见Michael Aris et al. *Lamas, Princes, and Brigands: Joseph Rock's Photographs of the Tibetan Borderlands of China*. China House Gallery,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92.

触克钦人，于1954年出版《上缅甸诸政治体系》，提出社会转变的动力学模型。几乎在同一时期，克里斯托夫·冯·菲尤勒-海门道夫在印度调查了10年，期间以特派员的身份在阿萨姆地区工作两年。他和妻子贝蒂·勃纳多在调查阿帕塔尼人^①的间隙中，专程到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斯皮峡谷，那里距离西藏的瓦弄咫尺之遥。因物资供应不足，1944年4月2日夫妇俩开始撤退，准备翌年再进行调查，后因印度政府决定推迟这项计划，最终未能进入西藏察隅地区。海门道夫基于田野调查的12本书^②对于青藏高原的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民族学家，无论是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还是中国人，都是在利用前人收集的原始资料、绘制的地图、提炼的概念、阐述的命题和他们的民族识别、文化分类的成果，并汲取他们务实与求真的精神力量。

中国学者对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民族调查可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左仁极、羊泽、朱刚夫、李式金、李中定、陶云逵、黄举安（以姓氏笔画为序）等人曾赴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并流地区，调查成果虽然一鳞半爪，但科学精神不可低估。李霖灿、方国瑜、杨仲鸿对纳西语的研究尤其值得一提。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我的同仁，如王辅仁、王晓义、孙宏开、刘龙初、刘芳贤、宋恩常、宋兆麟、吴从众、李坚尚、杨毓襄、张江华、姚兆麟、龚佩华、谭克让、蔡家骐、欧阳觉亚（以姓氏笔画为序）等，跋涉于川、青、滇、藏交界区的山水之间，也提出批判地学习和吸收西方人类学的任务。^③1979年，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在北京成立，后迁至拉萨，组织翻译了一批文献，吴泽霖、费孝通都身体力行地做过译介工作。^④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的研究起步较晚，田野研究缺乏长期性、系统性，理论方法上也有故步自封的表现，偏重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素材，而较容易忽视社会组织、风俗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素材。

① 中国民族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阿帕塔尼人与珞巴族人同源，阿帕塔尼是珞巴族的组成部分。珞巴族包含20多个部落，如尼升、巴依、玛雅、纳、崩尼等，其经济形态与独龙族完全相同。

② 它们是《赤裸的那加人：阿萨姆邦的猎头部落的战争与和平》（1939年第1版、1968年第2版、1976年第3版）、《苏班西尼地区的民族学注释》（1947年版）、《喜马拉雅山区未开化的民族》（1955年版）、《阿帕塔尼人和他们的邻族：喜马拉雅山东部的一个原始社会》（1962年版，有中译本）、《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信佛的高地居民》（1964年版）、《尼泊尔、印度和锡兰的社会等级制度和血缘关系：对印度教与佛教相接触地区的人类学研究》（1966年版）、《尼泊尔人类学述略》（1974年版）、《喜马拉雅山区的贸易者：尼泊尔高地的生活》（1975年版，前三章半有中译本）、《喜马拉雅山地部落：从牲畜交换到现金交易》（1980年版）、《阿鲁纳恰尔邦的山地人》（1982年版）、《西藏文明的复兴》（1990年版）和《在印度部落中生活：一位人类学家的自传》（1990年版中译本）。

③ 参见林耀华《序》，见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④ 参见《费孝通译文集·前言》（上册），群言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强调“补课”,出版了不少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著述,这是可喜可贺的。最近十几年,获得高级职称的中青年学者也越来越多。但是,不可否认,一些民族学工作者欠缺实地调查的经历,学界对田野调查的要求放松,对边陲少数民族的研究远远不够,市面上田野研究的著述稀少。有人说,目前田野工作的条件(如交通、通讯、住宿、饮食、医疗、安全、语言沟通、调查工具和手段等)较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知改善了多少,可如今的实地调查与书斋研究的比例较之于过去不知减少了多少。^①本人深有同感。我虽然退休多年,但也知道一点外面的情况。现在科研的资助力度每年都在增大,下达的课题也在增多,出版界欣欣向荣,民族类的期刊、书籍相当多;但是,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没有跟上来。由于辛勤收集第一手资料和认真提炼、精巧构思并以朴实平正的笔调叙述的作品不太为社会所赏识和鼓励,因此田野作品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与历史的发展很不合拍。就青藏高原东南部而言,随着旅游的开发,三江并流自然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社会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意识被带动起来了,国内外迫切需要了解这一区域的民族现状,抢救、整理和保存当地的原生态文化迫在眉睫。但经常到农牧区做调查的人不多。原因何在?这恐怕与投入和产出的衡量标准有关。譬如,有些环境陌生而艰苦,原创性作品生产周期长,即使出得来,社会反应也需要一定时间,不如“跟风”成效快。“不可否认,学界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评判成果室内室外一刀切的做法,都是使田野调查边缘化的原因。”^②我认为,端正调查之风、调整激励机制势在必行,否则民族学研究将难以为继,更谈不上以良好的姿态服务于社会。

西北川、青、藏交界区,以及西南边陲川、滇、藏接壤地区,民族学资源异常丰富,吸引着以何国强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不畏艰苦、锲而不舍地调研。这套由7部专著组成的丛书即有选择性地介绍了那里的民族文化。分册和作者名依次为《青藏高原的婚姻和土地:引入兄弟共妻制的分析》(坚赞才旦、许韶明)、《碧罗雪山两麓人民的生计模式》(李何春、李亚锋)、《整体稀缺与文化适应:三岩的帕措、红教和民俗》(许韶明、坚赞才旦)、《独龙江文化史纲:俅人及其邻族的社会变迁研究》(张劲夫、罗波)、《青藏高原东部的丧葬制度研究》(叶远飘)、《妇女何在?三江并流诸峡谷区的性别政治》(王天玉)、《滇藏澜沧江谷地的教派冲突》(王晓、高薇茗、魏乐平)。翻开细细品

① 参见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② 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编订:《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序言》,周云水、许韶明、谭青松等译,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4页。

味，看得出作者们长期研究的积累。主编何国强教授是我的学生，也是这个研究团队的组织者。他17年来坚持探索汉藏区域文化，主张多学科相结合，调查素材、史志和理论三点互补，中外资料融会贯通，以及汉族区域和少数民族区域的文化现象互为衬托的研究思路。自1996年夏天至今，他已11次踏上青藏高原。担任博士生导师以后，他努力寻求基金会的支持^①，推动每一届研究生到青藏高原东部和东南部选题作论文，秉承老一辈民族学家研究西南民族的传统，深入偏远的高山峡谷。据我所知，另外10位中青年作者在跟随他学习期间，除极少数人之外，皆有1年左右的调查经历，目前分别在高校或科研部门工作。他们的成果与书斋式的研究不同，每一本书都充满鲜活的材料，讲理论、重实际，穿插纵横（时空）比较和跨文化研究（类型）比较，散发着田野的芬芳。

调查员根据已有的知识草拟提纲，到当地观察、询问和感受，苦学语言，一丝不苟地记录，孜孜不倦地追寻文化变迁的足迹，修正调查提纲和理论预设。他们入乡随俗、遵循当地礼节，与村民建立互信，由此获得可信的感知材料。但这套丛书不是田野材料的机械堆砌，而是在科学方法和理论模块引导下的分析、综合与描述，不仅揭示了该地区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风俗制度的动力和机制、传统生计的命运、社会转型时期妇女的角色变迁等——而且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切合实际的解答。

这套丛书坚持了民族学研究偏远之地的优良传统，同时强调多维视角，突出科研的前沿性、创新性及应用性，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具有弥足珍贵的作用，同时给东南亚乃至世界的民族学提供了参考价值；在抢救和整理濒临绝境的原生态文化方面，体现了学术研究在增进国民福祉及促进社会和谐过程中的作用，在为西部开发提供决策依据并带动民族文化的保护性研究等方面均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这套丛书还凸显了“好料做好菜”的诀窍。前期4个课题资助，10余年田野调查取得的第一手资料绝不会自动转化为社会公认的产品，需要紧扣“民族特色”提炼选题，科学搭配，形成整体效应。编者先是将婚姻与丧葬制度、血缘组织、传统生计、本地宗教和外来宗教（东巴教、藏传佛教和天主教）的碰撞、妇女地位、先进民族的帮助与后进民族的发展等选题集合在一个总题目下共同反映特定区域的文化，“好菜”就做了一半；继而在中山大学

^① 本研究相关课题获得4次资助，即“青藏高原的兄弟共妻制研究：以卫藏和康的五个社区为例”（香港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基金，2004—2005年）、“青藏高原东部三江并流地区民族文化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2006—2008年）、“三江并流峡谷的民族文化和社会结构变迁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7—2009年）、“川青滇藏交界区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动力学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2—2014年）。

出版社的鼎力协助下申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争取新的资源来整合后续工作。这样，整道“菜”就做好了。以上两点在何国强教授与中山大学出版社的通力合作中可见端倪，同时专家的支持^①也相当重要。在这个基础上，各分册的作者和责任编辑保持良好的互动，认真审稿，精益求精地修改文本、补充资料、优化结构，本着为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待自己的职业。凡此皆说明学术界与出版界的精诚合作对于完成科研成果转换的重要作用。

^① 这套丛书于2011年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2年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两次申报工作，均得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任新建研究员和中国人民大学胡鸿保教授的极力推荐。

前言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要讲述故事发生的舞台——澜沧江谷地，并非实体指代，而是以澜沧江为轴线，上起盐井，下至维西，西跨碧罗雪山抵贡山丙中洛、秋拉桶等地，东越云岭，及巴塘处，刚好形成了一个以澜沧江为主干动脉、以其周边地方为枝叶的树状关系网。从地理位置上看，其位于“藏彝走廊”的核心地带，纵列的高山峡谷使得这一地区自古便成为羌、氐、戎等民族迁徙流动的重要民族走廊，经过长期的交流与融合，形成了目前以藏族为主体，兼有纳西、傈僳、独龙、怒以及汉在内的多民族聚居区。现如今，在这里，不同的民族信奉不同的宗教，甚至在同一民族内亦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原始宗教、苯教、东巴教、藏传佛教、天主教以及基督新教，成为当地的主要宗教派别，人们可自行选择属于自己的一片精神天空，“香格里拉”所赋予的精神内涵真实地展现于这片土地。

然而，这种多元宗教和谐共处的景象却来之不易。历史上，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的对话与冲突就曾在这里激情上演。缘于宗教信仰上的巨大差异及政治权利上的严重失衡，尤以近代以来西方天主教与本土藏传佛教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以巴塘地方为例，在1863—1905年间，这里就爆发大小教案6次，平均7年1次，其中有的教案绵延数十载，有的甚至超越巴塘边界，波及邻省，酿成历史上少有的巨案，无论从爆发频率还是激烈程度而言都实属少见。

按下葫芦又起瓢的“佛耶冲突”使天主教会不得不有所反省。为缓和与当地藏文化（以喇嘛信仰为核心的佛教文化）之间的尖锐矛盾，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传教人员就体认到了天主教的本土化之路乃势在必行。30年代，瑞士伯尔纳铎会临危受命，进驻康区。为挽救始终打不开局面的教会事务，伯尔纳铎会即着手对天主教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本地化改造，其第一步便是大力发展教会学校教育，培养本地神职人员。然而，正当他们踌躇满志之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截至1953年，所有西方传教士都被当作殖民帮凶悉数驱逐出境。天主教活动也被迫转入地下，零星存在于私人或个别家庭聚会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贯彻，天主教才重新恢复起来。此时，他们

吸取了经验教训，更加注重与地方社会、文化之间的适应与融合，加大了自身本地化和世俗化的力度。需要说明的是，本地化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个过程，其间涉及主客体文化之间的双向交流和碰撞。也就是说，在天主教的本地化过程中，冲突与矛盾还一直伴随其左右，如影随形。有鉴于此，本书将以清末民初发生在这里的“佛耶冲突”为切入点进行论述，然后再带着这份沉甸甸的历史记忆步入田野，去搜寻现实生活中还零星存在着的教派冲击与反弹，当然还包括教派之间交流互动、共生共荣的景象。

基于上述构思，本书在框架设置上分上下两编，共八章。上编“追溯历史”包括四章，主要是在广泛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天主教在百余年的时间内如何进驻该区、如何适应环境（包括自然与人文），后又如何被驱逐出境这段历史做一番梳理，并试图对官府（清王朝及西藏噶厦政权）、洋人（传教士及其后盾殖民者）与百姓（主要是信仰佛教的当地藏族僧俗）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做全面而又细致入微的剖析。通过这段历史的追溯，可以发现：天主教进驻该区虽然从一开始就特别注意对当地自然、人文环境的利用与适应，但比较而言，对人文环境的留意更弱一点。也就是说，当时传教会对天主教的本地化体认不够。这正是传教会虽能进得来该区但却与当地僧俗一直冲突不断的原因所在。教案发生后，清廷临之以威，严惩闹事僧俗，但一时的屈服只为下一次更大冲突埋下引线而已。摩擦不断的历史经验给了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起来的天主教一教训，于是传教会开启了当下天主教积极融入本地文化的自我更新之路。

下编“步入田野”亦分四章，以西藏盐井天主教会为中心做个案研究，在充分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主要从天主教仪式、天主教徒的信仰和世俗生活等方面进行考察，看看它在本地化过程中是如何实现与当地主要宗教派别——藏传佛教的适应及调试的。与此同时，通过精细的分析，从理论层面上构建盐井天主教本地化过程的解释框架，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宗教本地化过程的解释范式进行再思考。研究发现，在本地化过程中，盐井天主教与当地藏文化之间不断进行着相互交流、借鉴、对话与融合。目前，盐井天主教与藏传佛教是地位平等的两种宗教，抹消了彼此的排斥和多年的恩怨，以邻居的形式，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尊重、扶持地存在并发展下去。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借鉴了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历史与现实相联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丰富的档案文献和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或个案实例为重要依据，不但在宏观层面上展示出了一副“冲突→反省→融合”的活生生的画面，而且对每一阶段都采用了微观性视角进行鞭辟入里的剖析，试图对研究对象作出公允、诚信和实事求是的描述和考究，从而揭示其本质和发展演变规律。因此，《滇藏澜沧江谷地教派冲突》一书的出版，有助于学界及

钟情于藏区宗教文化生态的朋友更深刻地体认到藏区宗教的民族特色和区域特点，并对当下藏区甚至是其他地方各教派之间的对话、交流与互动提供参考与借鉴。

王晓

2013年5月

目录

上编 追溯历史

——十字架在澜沧江谷地的架起与倒下

第一章 澜沧江谷地一瞥/3

- 第一节 自然地理..... 4
- 第二节 人文环境 10
- 第三节 多元宗教生态 16

第二章 外来的闯入者/20

- 第一节 从约翰长老的故事说起 21
- 第二节 我们被从一座门赶走 22
- 第三节 我们从另一座门进去 28

第三章 此起彼伏的佛耶博弈（上）/36

- 第一节 1873 年巴塘教案 36
- 第二节 1879 年巴塘教案 39
- 第三节 1881 年梅玉林案 47

第四章 此起彼伏的佛耶博弈（下）/55

- 第一节 1887 年巴塘教案 55
- 第二节 1905 年巴塘教案 65

上编小结/80

滇藏澜沧江谷地的教派冲突

下编 步入田野

——以盐井天主教的本地化为中心的考察

第五章 上盐井天主教堂/95

- 第一节 藏区天主教堂概况 95
- 第二节 上盐井天主教堂的位置和外观 99
- 第三节 新旧教堂的更替 106
- 第四节 教堂的内部陈设 108

第六章 天主教徒的世俗生活/111

- 第一节 物质资料的生产 111
- 第二节 人口的再生产 120
- 第三节 特殊的婚姻家庭 126
- 第四节 教育生活 132

第七章 天主教仪式/140

- 第一节 仪式的主持者和信徒 141
- 第二节 周期性的仪式 145
- 第三节 人生礼仪 154

第八章 天主教信仰的本地化/165

- 第一节 盐井的第一位藏族神甫 165
- 第二节 天主教徒的族群关系和伦理 170
- 第三节 天主教徒和社会环境的调和 180
- 第四节 天主教对内与对外的调和 183

下编小结/191

参考文献/195

后 记/203

附图表目录

图 1-1	山高水急的怒江大峡谷	7
图 1-2	法国传教士所拍摄的溜索过江图	9
图 1-3	“圈层结构”示意图	14
图 5-1	盐井在世界上的位置	99
图 5-2	盐井乡示意图	100
图 5-3	上盐井村居图	100
图 5-4	上盐井新教堂图	101
图 5-5	茨中天主教堂整体外观	104
图 5-6	典型的藏屋外观	105
图 5-7	上盐井旧教堂示意图	106
图 5-8	上盐井新教堂内部陈设图	109
图 7-1	茨中姚飞神甫为一名藏童洗礼	156
图 7-2	梳妆打扮的新娘	159
图 7-3	新婚夫妇聆听长辈说教	160
图 7-4	村头双亲队伍对山歌	161
图 7-5	赴教堂参加葬礼的天主教徒	162
图 7-6	赴教堂参加葬礼的茨中村民	164
表 5-1	上盐井新教堂各地教会捐款情况表	107
表 5-2	修建教堂支出情况表	107
表 6-1	纳西民族乡 2007 年农牧情况概览	112
表 6-2	(1) 上盐井村 2007 年经济情况统计 (1)	113
表 6-2	(2) 上盐井村 2007 年经济情况统计 (2)	113
表 6-3	上盐井村家庭规模 (2007 年)	124
表 6-4	上盐井育龄人口及生育情况统计表	125
表 6-5	家名一览表	131
表 6-6	盐井纳西民族乡初级中学学生数 (2004 年)	133
表 6-7	盐井小学学生构成	133
表 7-1	上盐井村民基本情况表	143
表 7-2	上盐井天主教徒年龄级和性别构成	143

表 7-3	上盐井人口年龄级和性别构成	143
表 7-4	2007 年 7—8 月早晚弥撒基本情况表	151
表 7-5	周五拜苦路基本情况表	152
表 8-1 (1)	天主教会盐井土地收购一览表	184
表 8-1 (2)	天主教会盐井土地收购一览表	185
表 8-1 (3)	天主教会盐井土地收购一览表	185